

2008年7月 第八卷

MOOK 悦读

主编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王元化先生未刊文稿辑录

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外一篇）

姐姐眼里的王元化

周作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

西南联大五十载记梦

杨宪益“幸免于祸”之后……

“打工文学”要不要进入“主流”？

地震碎屑

也谈情色文学与翻译

林彪的“怪病”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8

卷首语

含着泪水,编完了这一卷的《悦读 MOOK》。

五月九日,敬爱的王元化先生撒手西归,令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不到三天,川西又天崩地裂,一九四九年后,我国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降临,千百万百姓遭殃,伤亡人数逾数十万……噩耗传来,举国哀恸!

原定的编辑计划被打乱,我们忙于调整稿件。

元化先生走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元化先生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贡献,在当代无人可比,也无人可取代。”元化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对《悦读 MOOK》来说,其影响也是无可估计的。

近些时日,元化先生的形象不时浮现眼前。屈指算来,与先生相识已有二三十年了。编者曾参与创办并主持《文汇报读书周报》十五六年,元化先生十分关爱这份报纸,当年,他常对人说:我的重要文章都是放在《文汇报读书周报》上发表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编者离开了《文汇报读书周报》。元化先生一直为此愤愤不平。他一再鼓励我们再办一份读书类报刊,于是就有了这本《悦读 MOOK》。

翻开已出版的七卷《悦读 MOOK》,几乎每卷都倾注了元化先生的关怀。他常给这本杂志书出点子,提供稿件,介绍作者,并经常对版面、装帧设计等提出精当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尽管体力不支,每次见面总要问起《悦读 MOOK》的出版发行情况。上卷刊出韦卓民先生给元化先生的信时,编者写了个按语,请他看一下,他已经无力过目,嘱编者念给他听。之后点头表示同意,还特地关照:前次的按语中错了一个字,此次不要把“世兄”写成“师兄”。可见他的思维依然清晰。

元化先生走了,此卷刊出几篇文章,作为一瓣心香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和哀思。我们知道,只有更努力地办好《悦读 MOOK》才是对先生的最好的纪念,才能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MOOK 悦读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目录

Contents

■悼念王元化先生

- | | | |
|----|------------------|-----|
| 5 | 王元化先生未刊文稿辑录 | 王元化 |
| 11 | 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外一篇) | 汪丁丁 |
| 20 | 姐姐眼里的王元化 | 林 韵 |

■特稿

- | | | |
|----|----------------|-----|
| 26 | 周作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 | 止 庵 |
| 37 | 六十年前的于子三运动 | 傅国涌 |

■往事

- | | | |
|----|----------------------|-----|
| 46 | 西南联大五十载记梦 | 鲲 西 |
| 51 | 旧邮散记 / 杨宪益“幸免于祸”之后…… | 杨 苡 |
| 56 | 杨家兄妹与《坚强的人》 | 虞非子 |
| 61 | 看“人艺” | 陈四益 |
| 65 | 城市街巷的魅力——由《杭州街巷》想起 | 舒 簾 |

■人物志

- | | | |
|----|----------------------|-----|
| 67 | 性情中人,又弱一个——纪念高邻贾植芳先生 | 陆谷孙 |
| 69 | 饶宗颐先生散失在日本的一封信 | 李 庆 |
| 71 | 被误写与遗忘的杨人梗们 | 汪涌豪 |
| 73 | 评弹第一才子黄异庵 | 梁 捷 |
| 75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者多彩和坎坷的一生 | 杨小佛 |
| 78 | 人性迷失——成仿吾对关东大地震的态度 | 李兆忠 |

■悦读一得

- | | | |
|----|-----------------|-----|
| 82 | 读红手记 / 从黛玉的出场说起 | 徐缉熙 |
| 85 | 红 玉 | 林冠夫 |
| 90 | 制造“共同体” | 李伟为 |

■《世说》闲批

- | | | |
|----|-------|-------------|
| 94 | 人格的尊严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
|----|-------|-------------|

■文化现象纵横谈

- | | | |
|-----|------------------|-----|
| 97 | “打工文学”要不要进入“主流”? | 邵燕君 |
| 102 | 相关链接 黄麻岭 | 郑小琼 |
| | 打工、打工,最光荣 | 孙 恒 |

■书与插图

- | | | |
|-----|-------|-----|
| 103 | 高加索故事 | 汪家明 |
|-----|-------|-----|

■域 外 风

- | | | |
|-----|-----------|-----|
| 107 | 拉康的国学渊源 | 萧文泉 |
| 110 | 也谈情色文学与翻译 | 谢天振 |

■海外书情

- | | | |
|-----|---|--|
| 115 | 为联合国而死——信异教的明星——海中诞生的城市——昔日的辉煌——德国的历史反思——拿破仑的第一战——斯密的思想遗产——《浮士德》英译本之谜 | |
|-----|---|--|

■后睹亦快

- | | | |
|-----|----------------------------------|-------|
| 123 | 莫斯科和北京:“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的回忆 | 郭加申 译 |
|-----|----------------------------------|-------|

■书海巡游

- 131 地震碎屑
有此一说
- 138 我国贫困人口增加到八千万——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成为我国公众第四大关注问题——公车改革进展迟缓——国家教育经费欠账不少——农民工创办自己的博物馆——去年五分之一高校毕业生没找到工作
- 历史往事
- 141 五十五万“右派”是如何得到改正的 童青林
- 144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是如何泄露到上海的
王文正 口述 沈国凡 采写
- 148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美]约翰·托兰
- 人物志
- 152 林彪的“怪病” 蒋霞
- 157 朗朗：我不想死！ 郎朗
- 160 百岁老人周有光的回忆 周有光 口述 李怀宇 撰写
- 164 周恩来亲自签署自己弟弟的“逮捕令” 周秉钧
- 167 解读乔冠华晚年际遇的一封信 章立凡
- 171 仅有十二万存款的宋美龄 窦应泰
- 四面八方
- 174 中国航天员的诞生 范登生
- 177 名人没有说过的“名言” [美]小保罗·F·博勒等
- 179 几则小知识 二十一世纪研究会
- 183 俄罗斯的“80后”
- 185 幽默成就完美人生 王笑东
- 养生之道
- 187 乾隆长寿有秘诀 屈维英

王元化先生未刊文稿辑录

◎ 王元化

编者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王元化先生思想十分活跃的一个时期,他的反思,为当代中国思想史写下了耀眼而振聋发聩的几页。

进入新世纪,王元化先生思索的问题更广泛、更深入,纵横捭阖,对文化、艺术、历史、哲学甚至流行歌曲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然而,他毕竟已步入高龄,平时撰文又十分严谨,每每要反复斟酌,有时写一篇文章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平时言谈中许多闪光的思想未能留下,殊为遗憾。于是,编者向他建议,能不能编一本《元化谈话录》,把他许多精辟的观点记录下来?元化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元化先生排定了一些选题,有谈文化的,有谈哲学的,甚至还有从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首流行歌曲谈艺术传统的……他并不是信口而谈,每一个专题都看了大量资料,并认真思考。别人记录后,他还要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他是用这种形式来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期间,在一些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几篇这种形式的“谈话录”。

当时,编者正在试办《悦读》,元化先生对此十分支持,把进行了两三个月整理而成的一篇“谈话录”交我们发表。拿到先生审定的光盘,我们十分高兴。但正要付梓之际,先生突然告知,由于对谈论的对象有新的看法,这篇稿件决定不发表了。我们觉得非常可惜,先生安慰说,我本是借这个题目来谈自己的观点,这篇“谈话录”的观点我还是坚持的,以后想一个其他办法发表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谈话录”这项工作并没有再进行下去,先生对此曾表示过遗憾。如今,先生许多闪光的思想,也随他飘逝了……

王元化先生过世后,为了缅怀他,我们重又打开了这个光盘。读着先生的“谈话”,仿佛又一次聆听他的教诲。现把先生当时审定的一些观点摘录如下,作为对他的纪念。

● 我是不懂科学的,过去在文章中涉及到一些科学家,只是由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很打动我。比如,爱因斯坦、霍金等。还有些科学家虽然不及他们那样著名,比如,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介绍的,二战期间他在德国留学时遇到的那几位科学家,普兰特(Prandtl)、微耳和(Virchow)等。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现在是一个人文精神逐渐衰落的时代,在一些科学家身上,却能发现人文精神还没有完全消失。

● 我在最近刊印的日记里,曾对老一代科学家表示了怀念。他们精通自己的专业,但不是偏狭的科学主义者。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发生了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比如,我在日记中提到的我的四姨父闻亦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协和医科大学教授胚胎学,但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不仅懂得古代的,对新文学也有兴趣。他的堂弟闻一多,小时就在这方面受过他的熏陶。另外有一位郑之藩(桐荪),也是一样。郑先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清华的数学教授。他和熊庆来都曾提携过青年数学家华罗庚。可是,他在专业之余攻读清史,当时有些史学家还曾上门请教。那个时代,这样的科学家很多。后来不同了。科学工作者为分工所拘囿,文化修养与上时代的人完全不一样了。尽管是某些执掌大学校政的科学家,对文科方面也几乎茫然无知。

● 《模仿·作风·风格》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一年,是给我翻译的《文学风格论》这本译文集所作的跋。书中的文章,均选自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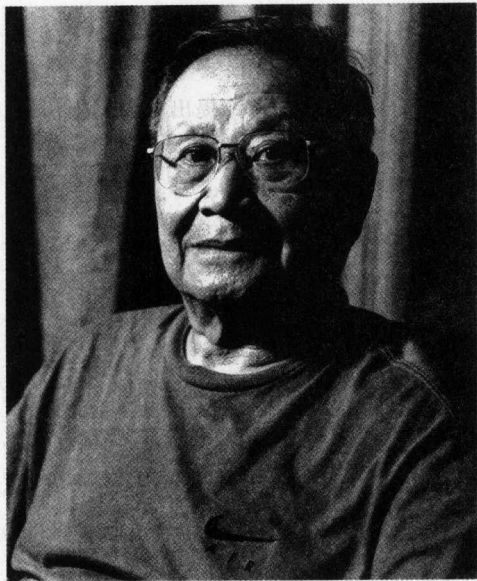
柏编译的英译本《文学风格论》;其中选有歌德、柯勒律治、德·昆西和德国语言学家威克纳格这四个人的风格论。当时,我曾特别将威克纳格论及风格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观点,与我国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比较。我认为,《文心雕龙》中《体性》篇所阐发的内容,即属风格的主观因素方面;而《定势》篇所阐发的内容,即属风格的客观因素方面。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从未涉及过的领域。因此,这篇《模仿·作风·风格》发表后,在文艺理论界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回应。研究古代文论的周振甫先生与詹鍈先生,后来发表的论述风格的文章,也都引述了我的上述观点。这些探讨,虽然使我们本来十分贫乏的风格理论丰富起来,但是,还有不少问题留待解决。比如,我们在阐述风格的主观因素时,都援引了法国文艺理论家毕封的名言:“风格就是人。”可是,为什么风格就是人?人哪些方面的特征,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与思想风格上呢?这是谁也没有进一步去探讨的。因此,这些文章在回答什么是风格时,总是简单地说:“风格就是人”,就算交卷了。

● 将构成风格的主观因素,归结为作者的性情、性格,并不是什么新的看法。我国古代早就出现过这样的理论。《尚书·皋陶谟》谈到人的性情,曾有九德之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周易》亦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些,谈的都是性格影响人的性行语言风格问题。后来,陆机在《文赋》中说:“夸目

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惟旷。”更直接地将这种观点运用到文学风格论中去。可见,认为风格来自性情和性格的理论,在我国早就很普遍了。风格的主观因素固然来自作者的性格,但是,性格规定了作者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才是作者性格具体化于作品中的风格特征。

● 风格理论从风格就是人——到风格来自人的性格与性情——到性格与性情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一认识的发展如果运用到文学风格上来,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弄清文学风格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将契可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进行比较研究,就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契可夫的语言风格是简练而不单调,明快而又蕴藉。虽然他的作品内涵孕育着一种忧郁的情调,但我们读他的优美语言,仍旧会时时引发一种清新明快之感。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语言风格,则是繁缛而又显得有些冗长芜杂和枝蔓披纷的。我们读他的作品,总是感到沉重压抑,有时甚至会觉得喘不过气来。他总是把我们引入一个沉郁深邃、痛苦无边的世界。我想,契可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不同风格,固然源于他们的思想内容,但也同样是从他们的性格出发,由此导致对生活的关注、材料的选择的差异,从而在思维方式上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而形成的。如果我们按照这条线索去探讨他们的风格特征,一定会取得一些新的收获,进入到我们过去没有涉及到的新领域。

● 中西语言文字的不同问题,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义符文字,和西方的音符文



晚年王元化先生

字的差异。这两种文字有各自的优劣。在文法结构上,西方的文字比较准确;而在音律结构上,中国的诗有许多东西是西方诗所不能达到的。这一点,对中国语言文字有所研究的人,都可以明白。中国的古文没有标点符号,但我们可以根据其中的音律节奏,自然地辨清其中的句逗。据说,唐文治老先生过去给学生讲授古文,主要用的是诵读的方法。他的诵读很有名,当时还灌了唱片,从中可以听出一种阳刚之美。而这就是中国语言文字中的音律结构特点。中国的诗学,从一开始就强调比兴之义。《周礼》的六诗说,《诗大序》的六义说,就是比兴说的滥觞。比兴之义讲的是离方而遁圆,意到笔不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因此,它特别讲究含蓄与蕴藉。由此,中国诗形成了模糊性与朦胧性。因为中国诗采取比兴之义,充满了明喻与隐喻,而不是直接写景写物,

自然使人不能一下子就明白它的含义了。西方的文化,来源于希腊与希伯来文化。所以,早期亚里士多德的诗论提出的自然模仿说,在西方有着普遍的影响。

● 记得抗战前,学术界曾有过一次有关京剧的讨论。当时如王文显、张庚等,都有过大体相同的说法。至于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这一说法,并不是我提出来的。我只是根据近数十年来许多人有关京剧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整理,再提出来罢了。我的意见,早在那篇《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中,就做过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了。这几年,我所做的一项工作,便是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些观点,来印证京剧的虚拟性、程式化和写意型的表演体系,从而论证这一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种类中,如文学、绘画、音乐等等,都具有写意的特点。此外,最近我还认为,《文心雕龙》在阐述审美主客体关系时,所提出的“心物交融说”,龚自珍在阐述创作者与鉴赏者进行艺术体验过程中,所提出的“善入善出”理论,以及陆机《文赋》在论述艺术创作行为时,所提出的非理智“应感”现象,都正好说明了京剧本身所蕴含的特点。这些特点,为西方艺术所无,而又是我国传统文化所共有的。

● 中国的传统道德,现在仍是一个最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九二四年,柳诒徵撰《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曾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的确,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上。柳诒徵那句话,只是中性的客观阐

述,并不含价值判断在内。“五四”运动时期,除了个别学者以外,几乎所有的文化先驱者,都是旧传统、旧伦理、旧道德的激进反对者。流风所被,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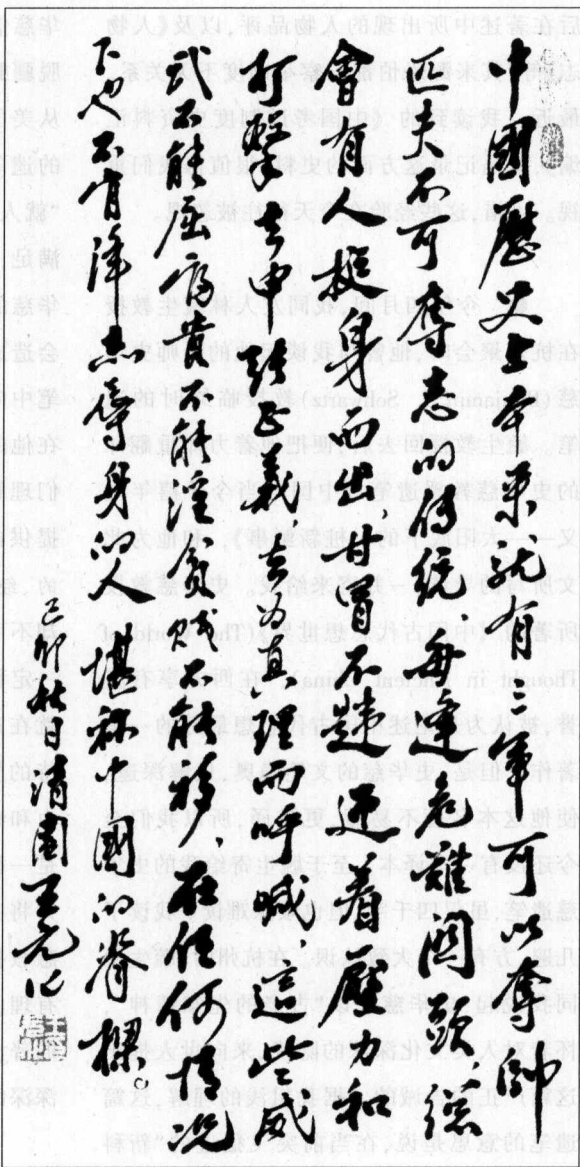
● 目前,多数人简单地沿袭着“五四”时代的反传统精神,对传统道德加以全盘否定,因此不可能把其中合理的因素,当做一种可以向现代化转化的资源。所以,目前我们这里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其实,这项复杂的巨大工程,是需要思想界、学术界,运用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现在,我所看到的有关道德传统继承的研究,往往只限于摘引前人或古书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比如,在文章里援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自然,这些名言警句确实体现了主体道德的和谐精神,或是儒家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内涵。但是,如果将传统道德中的合理因素作为一种资源,使之向现代化转化,这样做就很不够了。我们必须进入到传统道德的思想结构中,去探索,去发掘,才能更深入地做好这项工作。我在这里不过是作一点个人的呼吁而已。

● 我想说明一下最近的一些想法。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只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仅仅偏重于个人的修身或修养,从而会成为体制改革或法治建设的障碍。因此有些激进者认为,目前只应讨论体制和法治的问题,而反对提出传统道德的讨论。我以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的传统伦理观

念,确实属于一种内在的超越,而当前中国的改革,首在体制与法治的确立,这是不错的。但法必须由人来制定,法律也必须由人来实施,当今法治最完备的国家,人的因素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所以,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说:“自由宪政主义是保留(法治和人治)各自的优点,同时减少各自缺点的技术。”任何意见趋于极端,执一偏之见,就成问题了。一些激进者虽然对儒家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却对儒家思想并没有多少了解。其实,儒家也并不是不要法律制度。孟子便说过:“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当然,中国的传统中缺乏法治(rule of law)资源,只有作为统治手段的法制(rule by law)。早期的法家,以及后来各个朝代的律法,直至大清律,都属于此类。孟子所说的法,纵使与法家的法不完全相同,也并不属于法律主治的意义,没有超出法制观念的范围,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的传统资源。不过,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学术界还从未认真探讨过,以上只是我不成熟的看法。

● 我觉得,在体制建设上,中国的传统在某些方面,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资源的。比如,中国的文官制度。如西周的选士,汉代的察举,隋唐的考试,明清的科举,这些都应该受到重视。过去西方的一些启蒙运动者,在反对世袭制度

时,曾对中国的考试制度加以推荐与赞许。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就如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给予西方很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官制度,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就注重选举贤良,并积累了一整套办法。据史书记载,远在先秦时代,每当发生天灾人祸,



王元化先生手迹

国君就要下罪己诏,举贤人。前些时候发布的,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子思子见鲁穆公》中便有:“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即是举贤人的例证。到汉代,选官则有察举制度。所谓察举,就是要到社会各方面去寻访考察,听取意见。当时有些将相出于闾巷,其原因即在此。我甚至这样想,在文化和风俗习惯上,汉代所流传的月旦人物,以及稍后在著述中所出现的人物品评,以及《人物志》等,其来源恐怕都与察举制度不无关系。最近,我读到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汇编》,就是记录这方面的史料,很值得我们重视。可惜,这些经验在今天往往被忽视。

● 今年四月间,我同友人林毓生教授在杭州聚会时,他曾与我谈起他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临终时的遗笔。毓生教授回去后,便把他着力郑重翻译的史华慈教授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和他为此文所写的导读,一并寄来给我。史华慈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在西方享有盛誉,被认为是论述中国古代思想最好的一本著作。但是,史华慈的文笔隐奥,见解深邃,使他这本名著不易懂,更难译,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一本译本。至于毓生寄给我的史华慈遗笔,虽仅四千字,但也艰深难读。我读了几遍,方有一个大致认识。在杭州时,毓生便同我说起,史华慈是以“古老的先知精神”,怀着对人类文化深深的隐忧,来向世人提出这篇严正的告诫的。据我粗浅的理解,这篇遗笔的意思是说,在当前突飞猛进的“高科技·经济社会”中,人们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

物质享受,而形成一种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但是,在这种单纯的物质享乐与纯粹的个人满足中,许多人并没有想到,科技与经济的进步必将带来各种伦理后果。那些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忠实信徒反而认为,只要“完全专注于从科技、经济那边,看待人生每一方面”,便能有“一套全新的方式,来消除长久以来一切人生苦难的成因”。这就是史华慈借用宗教语言所说的“千禧年主义”。当脱疆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已从美国开端,并向世界各地蔓延时,史华慈的遗笔等于是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人作为人而言,得到越多的物质享乐和满足,就能过得更美好、更幸福吗?”我想,史华慈的看法大概是,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将会造成精神上的真空世界。所以,他才在遗笔中向世人发出他的告诫的。我觉得,毓生在他的导读中写的最后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史华慈遗笔中的深意:“人文学科所提供的资源,尽管与它们的(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环境有关,但却不可能化约为这些环境因素。只要它们在一定程度内是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纪录,它们就在这个程度内给我们提供了需要认真对待的资源——只要我们的兴趣经由人的自由和独立来处理问题和寻求意义。”这不正是一种人文关怀吗?一向对中国怀有深情,并将自己的精力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史华慈教授,在他的遗笔中说:中国今天实在没有理由为西方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涵义的普世理念蔓延感到兴奋(大意)。我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来读他这句话的。

——史华慈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日

史华慈遗笔,林毓生译,台北:联经出版

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外一篇)

◎ 汪丁丁

我去医院探望元化先生,在他去世前一天。那时他已不能交谈,侧身躺着,手伸出来,示意我坐在他床边。他处于清醒与昏沉频繁交替的状态。握着他的手,我注意到检测仪显示的各项数据之间有一些联系。心跳频率超过每分钟一百次时,他会醒来,看着我。心跳频率低于每分钟九十次时,他会沉睡几分钟。这似乎表明,他醒来是因为心跳速度太快以致无法入睡。以这样的方式“休息”,当然很累。有一次醒来,他很清醒地问我:“最后,会很痛苦吗?”我回答说:“不一定,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他点头,表示明白。

先生是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去世的,似乎没有很多痛苦。我记得我用笔和纸与先生交谈,是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那一次,先生可以坐在轮椅里,他喜欢开窗,有细雨伴着风吹进来。我们去探望先生,通常是在早晨八时至九时之间。因为先生的助手曾告诉我和妻子,先生在那一段时间会处于较好的状态。我在纸上写:“舒展请我转告您两件事情。其一,您写给吴江的那封信,谈卢梭的,他重读了,有新的感受;其二,杭州那棵常看您散步的大树,他去看过了,它很好。”先生微笑,他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在纸上写:“《文汇报》售完,我在读您和毓生先生的对话,第一部分。我还读您的‘鲁迅小集’,现在的年轻学者,许多受他的杂文风格影响,‘新左派’。您一九八一年及二〇〇六年谈到鲁迅研究的设想。”先生表示理解我的思路,并询问海外学者的诸种思路。我又写:“历史感,必须体验,海外的学者难以有‘体’验。顾准和您都承受过苦难。十力:悟。”先生回答:“顾准是承受了大苦难的。”我在另一张纸上写:“韦伯曾精神分裂症七年,他那时认识到任何一段历史及问题都可无限复杂。病愈后,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故您的思想,很重要!远非学界可了解。”这一次,那张纸,先生读了两遍。我指的是他谈逻辑不能涵盖历史丰富性的那几篇文章,涉及黑格尔《小逻辑》及他的“总念”说。我继续写:“我一直认为韦伯的‘Ideal Type’理想型,其实是黑格尔的‘总念’——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体的逻辑表述。”先生读完立即问我是否找到了贺麟翻译的《小逻辑》第一版,我说尚未找到。半小时后,先生见到助手,请她继续找那本书,并寄给我保存。此事的缘由是这样的,大约一年前,我和先生在庆余别墅他的居所,谈到《小逻辑》的不同版本。我告诉先生,贺麟译本,我喜欢第一

版——以其“总念”翻译思路,我不喜欢其后的版本——因受列宁哲学笔记之影响太大。可惜,我遍寻第一版而不能得到。先生说,我应去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保存的《小逻辑》,那是商务一九五五年的第一版。

继续我们的纸和笔的交谈。先生问我最近思考的问题。我写:“西方‘法治’在中国传统内,需要寻求文化表达。我希望将来研究此问题。‘民主’和‘自由’,是可以有不同文化表达的。”

大约二十天后,我和妻子再度去上海探望先生。仍以纸和笔交谈,我写:“可是我仍担心您的思想会如顾准的一样,被吹捧多于

被深切理解。”先生点头说这也正是他想到的并且最担心的。我继续写:“十九世纪的人文精神的外在特征——宽容、自然。二十世纪的革命遗产——偏激、扭曲。二十一世纪若有自己的什么,也是现在极难确定的。”先生拿着我写的字纸,仔细读,然后表示同意。

稍后,护士来为先生做输液的准备工作。先生回床上躺着,指示我坐在床边椅子上。良久,时间接近中午,我和妻子向先生道别。先生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让我握住,手是凉的。他说:“等我出院了就去杭州看你们。”我说:“一定,我们过几天还来看您。”眼泪不等我说完就涌出来,迫我不能回头,走出病房。

简论王元化先生在《财经》发表的一组文章

编者按:

王元化先生逝世后,汪丁丁先生接连写了数篇文章,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其中《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一文长达近两万言,尚未在纸质媒体发表,现征得汪丁丁先生的同意,摘录部分内容,刊登于后,标题为编者所拟。

自二〇〇三年开始,王元化先生在《财经》知识分子栏目发表了一系列信札和随笔。这些文字饱含深意,尤其是在他辞世后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言,解读刚刚开始。深刻的思想者,要么永远被世俗生活遮蔽,要么,被赞颂远多于被理解。我们,与元化先生一样,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不过,哪怕仅仅为了祭奠元化先生在天之灵,我们也应将这一初步的工作呈现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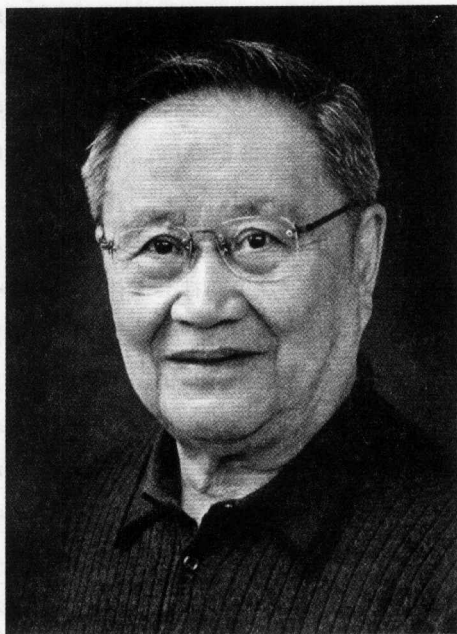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更加相信怀特海(N. Whitehead)晚年写在《思维模式》里的一项重要看

法: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表达的复杂性可因人而异,可因社会交往的性质而异,也可因时代的变迁而异。正是关于这样的复杂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维度。在现实问题面前,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问题面前,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或具有复杂性的自由主义,往往表现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思想方法的优势。借助于这一优势,在极端复杂的情境之内,我们得以坚持“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

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需要变得更为复杂。它既要兼顾“自由”与“民主”在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的文化表达,又要兼顾“效率”与“正义”诸议题在中国社会和在西方便社会由此发生的不同的情感方式,还要兼顾“市场”与“政府”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内和在西方政治经济格局内的不同涵义和发展。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的立场绝非可以一劳永逸地定义为与具体情境无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度。王元化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正符合这样的情境相关性,从而表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从王元化先生在《财经》发的这一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在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于《财经》杂志的文章里,元化先生指出:“……这次政府抗击 SARS 的行动让人感到温暖,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为什么这次政府的政策得以较为顺利地贯彻,比较获得人心呢?那就是因为本届政府注重责任伦理,把人的生命放到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条件。不过,就这种措施本身来说,它是在体制改革还没有实现之前,只能采用的手段。运用这样的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所依靠的是领导的开明,否则,采用同样的行政手段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过去的大跃进就是一例)。我们不能过分信赖这套行政手段,因为它只能用于一时,而不可行之于久远。……它只能是在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以前,在政治文明的目标实现之前,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倘不坠入空谈高调,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实在也别无更能行之有效的方案可循。我甚至认为在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也还



王元化先生像

只能如此。自然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此处,元化先生承认民主政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故不愿“坠入空谈高调”,他所希望的,是那些保持了责任伦理和人文观念的政治家们或许在追逐私利的政客们的权力格局内逐渐占据优势,至少,在实现民主政治之前不要完全被追逐私利的政客们压倒。

他还注意到:“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很多不好的现象也在危机中暴露出来。一些人不讲公德,随地吐痰。有的患者明知自己有病,还出来游玩。甚至还有 SARS 患者从医院逃出来,到公共澡堂去洗澡。这是

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 SARS 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元化先生论及社区的性质:“现在我们的社区还不是民间社会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的根本精神是自治,是市民或村民按照自愿的意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里且以美国的社群为参照,美国每一个镇都是一个社群,它有自己的通过选举所产生的管理机构,镇并不对县或州负责,它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在镇、县、州和联邦之间,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社群,只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比如州的立法不能违背联邦的宪法等等。我们现在的社区,在历史传统上与保甲制度有关。一九四九年之后,我们采用的是街道里弄组织,它们都是区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或政权机构的延伸,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它们是以贯彻上面的政治任务和领导意图为主要目标。它们不是自治的、服务性的,更多的是管理、控制的功能。……当前社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它应该是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作为社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步过渡。”

数年后,二〇〇五年十月三日,《财经》杂志发表了元化先生与林毓生先生关于西方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的通信。当年三月二日,他们的讨论从现象层面开始,元化先生口授:“这里乏善可陈,令人郁闷。现和你谈点文化方面的事,去岁十二月中旬,几位

热心朋友倡议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一次‘清园书屋笔札展’,我同意了。展品是我用毛笔书写的拙著中的各片段,每幅二百字上下。目前媒体上所报道的文化活动不是为了炒作,就是带有广告性质。充斥在报纸、杂志、戏剧、电视、舞台上的,大都是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字和图像。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我不禁想到赫尔岑那样的问题:‘这是谁之过?’作为一个知识者,我们自然是有责任的。但这不能仅仅责怪知识者,这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种决定文化导向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一想及此事,真是令人悲从中来。我已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

同年六月三十日,林毓生先生答复元化先生:“……文化庸俗化现象,在港台的年青人身上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例外),在那边,大家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目前塑造年轻人‘无意识’与‘无品味’的最大力量,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各国制度尽管不同,许多年轻人趋向享乐,趋向低俗的情况,大同小异。我本来以为欧洲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对于人性物质化及动物化的侵蚀,应该比较能有较大的抗拒力。但,事实不然。欧洲文明世俗化,物质化与动物化的程度,有些地方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非西方文明,一旦遇到了史华慈先生遗笔中所指谓的当代西方‘排它性物质主义的宗教(the

exclusive religion of materialism)’,虽然各地反应有些不同,但都显得招架无力,其精神传承都被这股强劲的力量排挤了。……先生信中所说的,除了受到前述被西方文明所支配的普世现象的影响以外,当然还有国内的特殊原因。两者加在一起,情况比西方还要严重。您对未来大概也是感到悲观的。……在这‘排它性物质主义的宗教’日益猖獗,将逐渐席卷世界的时候,个人所能为力的,实在相当有限。我看只能把分内的事情尽量做好,友朋之间相互慰藉而已。”

二〇〇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元化先生在《财经》发表“《约翰·克里斯朵夫》书评”,他指出该书第六卷表达的爱和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因反抗而有的偏激心态:“……过去我爱读的是这部书的第四卷‘反抗’和第五卷‘节场’。克里斯朵夫不顾一切想要去涤除艺术界多年积存的油垢,向那批用艺术以外的手段去骗取金钱、地位和名誉的文士进行挑战,那时我是多么倾倒在克里斯朵夫啊!我觉得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成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可是,这次重读,我发现,他的批评并不总是对的,有时他做过头了,把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也一概践踏在脚下。……这次重读,我最喜欢的是第六卷‘安多纳德’。……安多纳德在上一卷和克里斯朵夫在剧场偶然相遇,接着就消失了。第二次再见,是驶往相反方向的两列火车的车厢窗口,他们认出了,但是来不及相互招呼一下,火车就开走了。过了很久,第三次再见,是在喧嚣、嘈杂的巴黎大街上。他们又偶然见到了,都挣扎着企图走向对方,但被车马人流冲散了,像两个流浪星球似地接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这样的主题出现了三次之后,紧接着,书

的第六卷就是‘安多纳德’。我读到这一卷所感到的女性美、人性美、人间的爱,是我在前两次读这书时很少感到的。”接着,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于《财经》的另一篇书评里,元化先生告诉读者:“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我就对将政治外加于文学而提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之类的理论感到格格不入,后来甚至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我也不赞成现在颇为流行的所谓纯文学观点。古往今来,能够震撼人心、垂诸后世的巨著,都不像现在流行的纯文学观理解的那样,是绝对排斥作家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人类文明前途的焦灼这类内容的。……抗战前有人认为,随时随地都不要忘记国难,例如吃西瓜就要想到山河破碎。鲁迅曾讥笑了这种观点,认为,果真如此,那么连西瓜也吃不下去了。……当然,也有浑身都是闲适、毫不关心其他问题的纯文学之作。目前有人正在吹嘘这类作品,而不见其低浅,反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我们看到,这里出现的,是对人生和文学所持的正确态度因依赖于不同情境而不能不有的复杂性。

在发表于《财经》二〇〇六年二月六日和三月六日谈京剧“伍子胥”的文章中,元化先生进一步阐述他自己的复杂的自由主义思想:“……春秋时代把他视为忠的表率,是以他对吴王夫差来说的。这同样和后来对忠这个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呢?我想主要是对早期儒家的道德规范并不理解。后人多以为孔孟倡导的是愚忠愚孝,这乃是后人的一种误解。以君主为本位,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孔孟的君臣之道是建立在双向关系上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一步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讎。

杀掉昏主暴君，孟子甚至认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口闭口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我曾经和持这种主张的一位老友说过，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愿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倘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希望他直言批评。他一直殚精竭虑为民主宪政而呼吁，我想他会接受我的意见的。不料，他说不能再花力气做这些事而拒绝了。这使我很失望，我觉得他在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这种既定观念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不容反驳的，这就是‘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其实这种反传统精神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那里就已形成，‘五四’只是将其推向极端罢了。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以恢复希腊罗马文化为宗旨，‘五四’虽因袭文艺复兴之名，（最明显的是‘五四’代表刊物《新潮》即以 Renaissance 为英文译名），实际上却恰恰悖道而行，以反传统为纲领。‘五四’的反传统就是‘五四’思潮和‘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谁如果对‘五四’思潮、‘五四’精神的某些消极因素或错误观点（如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观、功利态度、激进主义）加以质疑而进行反思，那么他就一定是在倒退复古。因此，这些不容对‘五四’进行反思的人采取了一种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态度。‘五四’自然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但是，真正要做一个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

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没有学术研究。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至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

一九四九年以来，国内知识界关于“五四”精神有过多次讨论。元化先生一九九〇年代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我们看到，是“五四”与它之前和它之后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密切联系。二〇〇六年四月三日发表于《财经》的文章“辨儒法”，元化先生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上次谈到‘五四’时期反儒不反法，相比之下，儒家在思想上倒是较为宽松，近于民本思想的。上次我们只是点到为止，现在可以多谈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了。……章实斋对李斯颇为卑视，而章太炎则相反，称李斯为秦之‘功臣良吏’。清末以来有这种看法的不少，鲁迅也受到太炎的影响。他曾为始皇焚书作了一些辩说，而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对法家人物李斯、晁错等颇有好评。而对贾谊尤其是他的《过秦论》，则多贬抑。‘五四’时期虽高扬德赛二先生，但对秦殊少批判，直至后来‘文革’中的尊法批儒，以及马克思主义还要加上个秦始皇之说等，皆可从这种思潮中寻出蛛丝马迹。但迄今为止，这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未引起注意和讨论。”

关于人性之复杂，在《记任铭善先生》一